

# 文學現代性的建立： 二〇年代台灣文學論的啟蒙內容及其結構

[臺] 崔末順\*

## 目次

- 一、前言
- 二、實用主義論述和新/舊對立結構
- 三、民族主義論述和主體/他者對立結構
- 四、個性主義論述和真/假對立結構
- 五、結語

## 一、前言

二〇年代的台灣，由於是在淪為日本殖民地的處境下，與西方現代文化進行接觸，其現代論述一開始即帶有文化啟發和喚起民族自覺的強烈啟蒙性格。該時期新文學運動也是以新文化運動的一環展開，其文學論在受到西方現代文明強烈影響的同時，又將重心放在自我民族處境的改善上，因此，台灣的現代論述可說是在西方現代性的強烈磁場中所推動進行。

一般來說，現代性指的是伴隨著資本主義生產制度和方式，以及社會經濟發展過程，所形成的人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它以接受科學技術，重視合理性和人的理性，並相信歷史的進步，以及人的自我發展為其核心內容。以過去的歷史軌跡來看，西方現代的進展，是朝著在政治上形成國民國家，在經濟上成立資本主義市場體制，在思想上尊重個人的權利等方向展開。如此走向，不僅

---

\*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mschoi@nccu.edu.tw

是西方國家所特有，在往後的世界歷史進展中的其他地區也普遍適用。二〇年代的台灣新興知識分子，也深深體認到此歷史方向不僅應該追求，也必須積極接受；為了傳播此西方現代經驗和理念，他們發行報章雜誌，並利用初始形成的公共領域，發表言論，提出主張，漸次形成了現代論述。

二〇年代，人類方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不久，戰爭中被恣意利用的科學技術和物質文明普遍受到質疑和批判，人們不再那麼重視西方的船堅砲利<sup>1)</sup>，代之而起的是強調和平的文化主義。這時期台灣現代論述中，同樣可以看出充滿著文化主義的旗號。<sup>2)</sup> 在此之時，知識分子所關注的問題，是如何改善殖民地處境中的不平等地位，在這一點上，他們以自我覺醒和對民眾啟蒙的方式，來促使社會變革，進而圖謀未來。可以說，二〇年代台灣現代論述的首要命題，主要是透過新文化的普及和民智的啟發來推動社會改造，以及改善不平等的民族地位上面，在此時代精神和啟蒙氛圍中，初期文學論自然帶著濃厚的啟蒙色彩。另外，西方現代性的核心內容—個人主體的發現和個性的自覺，也普遍受到當時知識分子的重視，他們認為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現代理念和價值，因而反映在文學論中，發展出對文學固有特殊性的認知。他們體認到，文學在內容方面表現的是個人情感，在形式方面則可採用虛構和形象化原理，而這些想法帶來了與實用性學問不同的文學獨立性和自律性的新認知。如此，對文學獨立性的肯定，可說是台灣文學現代性的鮮明標識，它同時也體現了從傳統的「文」，獨立分化為現代「文學」(literature)的過程。由此看來，初期文學論中同時出現了看似矛盾的此兩種見解：一是文學成了為社會改革和民族發展而服務的啟蒙手段；二是認為表露個人情感和個性才是文學的本質所在。

另外，初期文學論的主要內容—文字改革和言文一致、白話文使用、新文學的建設等主張，有些是以新舊文學論爭的形態進行，<sup>3)</sup> 而這些參與者頗有堅

1) 二〇年代以前，知識分子對西方科學和物質文明，普遍表現出接受及希望學習的態度。例如，吳德功在1900年撰寫的《觀光日記》中，對西方現代文物感到驚奇欣喜之餘，認為要開啟本島人的智慧，就應廣為模仿與學習。《吳德功先生全集》(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

2) 《台灣青年》、《台灣》及早期《台灣民報》的發刊辭、卷頭言中，均曾出現多次「文化主義」的說法。

持自我主張為是的論述 (discourse) 性格，因此以論述性格來探討初期文學論也是可行。所謂論述，是指在實際狀況中，透過話者的口發出的話語，或是講話的方法。在論述行為中，語言意義的生產，主要在對話關係的原理 (dialogical principle) 上進行。<sup>4)</sup> 以論述理論來看，所有被發話的語言，都將成為社會現象，且其發話的產生和分配具備了某些規則性，因而形成了論述的結構和樣式，而這樣的情況，在口述的語言和書寫語言上同樣會出現，論述之所以會被認為是具有某種信念和能夠表達價值觀的書寫或講話，就是來自此一性質。由此可知，論述行為並不是毫無邏輯或隨意出口的話語，它為了說服聽者，必須具備分明的條理和體系，為了突顯自己的立場和價值的合理性，通常它又會採取對立結構來強化自我說法。就如新舊文學論爭中所見，無論是主張文明開化，或贊成固守傳統，雙方都認為自身的文學觀符合時代或歷史的使命，展現出強烈的論述性格。

本文根據上述文學現代性和論述性格，擬針對二〇年代台灣初期文學論的啟蒙論述內容進行考察，並就其結構進行分析。相信透過如此的考察和分析，定能探究出身處殖民地環境中，透過與西方現代的接觸，短時間內被迫編入現代歷史階段的台灣現代文學及其文學論的面貌和特質。

3) 有關此部分，已有許多研究成果問世：如廖漢臣，〈新舊文學之爭——台灣文壇一筆流水賬〉（《台北文物》3卷2期、3期）；莊淑芝，〈台灣新文學觀念的萌芽與實踐〉（麥田，1994）；梁明雄，〈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運動研究〉（文史哲，1996）；施懿琳，〈日治時期新舊文學論戰的再考察——兼論其對台灣傳統詩壇的影響〉（中華文化與文學學術研討系列——第四次會議：台灣古典文學與文獻，1998）；葉連鵬，〈重讀日據時期台灣新舊文學論戰——起因、過程與結果的再思考〉（《台灣文學學報》2期，2001）；黃美娥，〈對立與協力：日治時期台灣新舊文學論戰中傳統文人的典律反省及文化思維〉（《台灣文學學報》4期，2003，頁37-72）；翁聖峰，〈日據時期台灣新舊文學論爭新探〉（台北，五南，2007）。

4) 參考巴赫汀學派的論述理論，如Bakhtin, M. M & V. N. Voloshinov,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trans. M. Ladislav and I. R. Titunik, Harvard Univ. Press, 1973.)

## 二、實用主義論述和新/舊對立結構

以世界史的眼光來看，1895年台灣淪為殖民地，意味的是西方現代文明以全球性規模擴張其勢力的一個結果，也可說是台灣脫離封建清朝勢力，歸屬現代國家－日本的一個歷史事件。當時，日本藉由學習、模仿西方文明，成為後發帝國主義國家，進而在亞洲開拓殖民地，並試圖將台灣作為其殖民統治成功範例的展示場<sup>5)</sup>，因此台灣會走上現代化乃被視為必然。這當中，制度上的現代化措施和物質基礎的建設，從殖民初期即已開始進行，但在新文化的認知和知識方面的現代化浪潮，則是到了二〇年代才正式展開。一些在日本求學的台灣留學生接受大正民主時期的民主主義思想，加上受到中國辛亥革命、俄國社會主義革命，以及第一次大戰結束後抬頭的民族自決主義、朝鮮三一獨立萬歲運動、中國五四運動等事件或潮流的影響，乃開始進行各種形態的民族運動，並萌生「台灣應是台灣人的台灣」的觀念。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之下，新興知識分子所主導的新文化運動，主要是以接受西方現代文明和價值，作為台灣發展的基礎，並在同一基調中展開新文學運動。<sup>6)</sup> 如同從主導新文化運動的『台灣文化協會』名稱中，即可看出，「文化」乃鮮明的時代標語，究其緣由，除了武裝抗日的不易之外，<sup>7)</sup> 主要還是與第一次大戰之後對世界情勢變化的認知有關。

由著這個絕對的大不幸，死不完的全人類，已從既往的惰眠醒了。  
厭惡黑暗而仰慕光明－這樣的醒了。反抗橫暴而從正義－這樣的醒來了。  
排斥利己的、排他的、獨尊之野獸生活，而謀共存的、犧牲的、互讓的之文化運動－是這樣的醒來了。<sup>8)</sup>

- 5) 周婉窈，《台灣歷史圖說：史前至一九四五年》，台北，聯經，1997，頁152。  
6) 當然之前已有傳統文人透過官方主導的報章雜誌，與西方文明、文學接觸，但引發文學論爭等具規模又有體系的接受和討論，則是到了二〇年代新文化、新文學運動才開始。  
7) 武力抗爭從「臺灣民主國」的衛臺之戰開始，至1915年西來庵事件，始終持續不斷。其中從1907年至1915年為止，因而犧牲的義民不計其數，僥倖生存者中，有4423名被判死刑，682名判無期徒刑，1474名判有期徒刑。  
8) 1920年《台灣青年》創刊辭·卷頭言；後亦刊登於《台灣民報》七十二號(1925.9.27)。

這回聯合國的戰勝，簡直就是民眾的「文化主義」的勝利了。如今舊的世界成了廢墟，新的世界又將誕生的時候，我們對於過去的信仰希望，當然也不得不新陳代謝了。世界上百般的制度，都是進化上的過程。又宇宙間的森羅萬象，都是現滅不斷的事物。我們既若曉得這個道理，便就明白個人、國家、社會都是很不完全不固定的東西。<sup>9)</sup>

從上述內容可知，當時知識分子會採取文化主義，是因經歷過大規模現代戰爭之後，深刻了解到物質文明的弊害之故。他們認為唯有走上文化主義一途，始能維持世界和平，而此所謂用文化改造社會，改善民族處境的新文化運動中，文學又被認為是最適合擔負此一使命的領域。為了吸收乃至普及新文化和現代知識，文學首先必須承擔自我改造為「新文學」的時代任務，而此改造的訴求和主張，以及建構新文學的說法，亦即從文字改革、言文一致的主張、中國新文學理論與作品的介紹、對舊文學弊病的批判，以至建立台灣新文學的呼訴，無不藉著《台灣青年》、《台灣》、《台灣民報》等報刊雜誌，經過一連串的論述過程而逐漸形成。

考察主張建立新文學的一連串文章，最為明顯的特徵，大致為採取實用主義觀點，以及具有新/舊對立的論述結構。最早主張文字改革的陳炯和陳端明等人的言文一致論述，首先從批判舊文字和舊文章的難解以及不合時務性開始：他們對當時的文字和文章，做出「辭貴古奧，字貴難澀」、「拘泥法式」、「注重文面」、「句分駢散」、「文字艱澀」、「常人所難解」<sup>10)</sup>；「文體尚株守舊套，依然不改」、「徒佞浮華古典，表意不誠，非只多費時間，而用意深沉，人多不解」<sup>11)</sup>等的診斷，認為這些舊文的語言特色，已經妨礙到科學的進步、新文化的接受、教育的普及，以及民智的啟發等。從他們的論述中，不難發現他們—認為新的文字和文章，在執行新文化普及的任務上非常有用、有價值，但舊文字和文章卻會阻礙此一任務的進行，是沒有價值、必須淘汰—的實用主義觀點。

9) 炳，〈社會改造和我們的使命〉，《台灣民報》一卷四期(1923. 7. 15)。

10) 陳炯，〈文學與職務〉，《台灣青年》一卷一號(1920. 7. 16)。

11) 陳端明，〈日用文鼓吹論〉，原載於《台灣青年》三卷六號(1921. 12. 15)，但被禁發行；後重刊於《台灣青年》四卷一號(1922. 1. 20)。

甘文芳也在〈現實社會與文學〉<sup>12)</sup>一文中，探討一次大戰後國際道德與國際關係的轉變問題，認為文學應與此時代的轉變連結。他抨擊當時吟風弄月式的有閑文學，主張應以源自中國文學革命的新文學為借鏡，企盼能肩負「切迫的時勢要求和現實重圍」的文學出現。接著，提倡新文化運動的黃呈聰和黃朝琴，更於親赴中國觀察白話文的普及情況後，提出使用中國白話文有其必要性的主張：黃呈聰認為現今已不同於使用古典文的時代，現代人必須接觸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或者外國語，使用古文語體學習，勢必事倍功半，不易獲致實質效益，因此他強力主張言文必須一致，惟有採用中國已正在施行的白話文，方為上策<sup>13)</sup>；黃朝琴在概觀近來中國的文化運動之後，更提出創設台灣白話文講習會等具體的實行方案。以猛烈攻擊舊文學來倡導新文學運動的張我軍，也對偏重技巧和形式已變成「擊鉢吟」的台灣舊式詩文提出強烈的批判，他認為這些舊詩早已不合時代進展的潮流，必須加以排擊。<sup>14)</sup>

如此，從初期主張文字改革的陳炳、陳端明、黃呈聰、黃朝琴等人，到透過介紹中國文學解放運動，主張建設台灣新文學的許乃昌、蘇維霖、蔡孝乾、張我軍等這些新興知識分子，無不對舊文字、舊文化和舊文學的不適用進行批判，同時也呼籲應該重視新文明、新文化、新文學的實用性價值。特別是，在他們所強調傳播文明思想、警醒愚蒙、促進社會之革新的重要性，以及對當時文學不合時宜的認知中，明白展現出新/舊對立結構中所建立文學的實用主義啟蒙論述。<sup>15)</sup>

這些啟蒙論述中的新/舊對立認知，除了上述主張文字改革和接受新文化的文章以外，在具體的文學論當中也可以看到。張梗在〈討論舊小說的改革問

12) 甘文芳，〈現實社會與文學〉，《台灣青年》三卷三號(1921. 9. 15)。

13) 黃呈聰，〈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台灣》四年一號(1923. 1. 1)。

14) 黃朝琴，〈漢文改革論〉，《台灣》四年一~二號(1923. 1. 1-2. 1)。

15) 相關文章有秀湖(許乃昌)，〈中國新文學運動的過去現在將來〉(《台灣民報》四號，1923. 7. 15)；蘇維霖(蘇薊雨)，〈二十年來的中國古文學及文學革命的略述〉(《台灣民報》二卷十號，1924. 2. 11)；張我軍，〈文學革命運動以來〉(《台灣民報》三卷六~九號，1925. 2. 21-3. 21)；蔡孝乾，〈中國新文學概觀〉(《台灣民報》三卷十二~十七號，1925. 4. 21-6. 1)等。

題》<sup>16)</sup> 中，即透過新/舊小說的對立性理解來確保新小說的正當性：例如，他認為舊小說的內容千篇一律、描寫方式陳套、以教訓功能為主，而且不切實際、荒誕無稽，十足無聊的餘興遊戲之作；相反地，新小說描寫生動、具備個性、內容切合實際，又能反映新時代面貌，對當下現實危機也能提出批判認知，可說具有高度的價值。他認為欲將舊小說改革為新小說，首要「獨創」，也就是必須隨著場景或狀況，創造出生動的描寫，創造出具作者個性以及生命力的文體；而所謂「創作須含意」，係對舊小說為排遣無聊而作不以為然，因此認為創作須涵養「無限意味」的某種人生道理；「含意須深藏」和「排春秋筆法」，則對舊小說動輒以「微言大義」深覺迂腐，主張應該經過文學包裝，揭示在讀者面前，讓讀者自行去解剖，去做分析，而不是一味以生硬突兀又直接的概念展現；「唱科學的態度」，反對古小說以捕風捉影、憑空想像的各種荒誕無稽內容，作為小說描述材料；「歷史與小說須分工」，則是反對舊小說中鋪陳一些與小說結構不相關的描寫，認為必須改革為具備作者個性和以敘事為主幹的新小說。

最早以專文討論現代小說理論的這篇文章，在下面幾個地方，呈現了新/舊對立結構的啟蒙論述性格。首先，它在樣式上區分新/舊小說來突顯新時代的意識始具有價值的認知，在這裡「新」和「舊」，不僅指出時代上的差異，也指出內容和形式上不同的特質。新小說相較於舊小說，不僅合乎時代，也具備形式上的「新」和內容上反映新時代的樣貌，而這也是新小說所以會被追求，以及獲得認同及肯定的重要原因。第二，小說的內容方面，張梗強烈批判舊小說的虛蕩無據特色，主張必須以實際事實為基礎，創作出新的小說，才算是改革。以實際事實為材料創作小說，其目的在於能喚起對現實危機的批判性認知。也就是說，舊小說憑空想像的如「飛簷走壁」等非現實的內容，不僅對現實認知和批判毫無幫助，也不具任何實用價值。第三，在小說的社會功能上面，認為小說是一個能反映社會民心和風俗的指南針，也是啟蒙社會的一個手段。如此，強調小說的社會功能及政治效用論，此與慣以通俗性來看待傳統小說的態度有別，

16) 《台灣民報》二卷二十一號(1924. 10. 21)。

它反映了當時的啟蒙論述性質，而且它針對既有小說的非現實性和非道德性所提出的批判，以及就此提出新小說所應具備的題材寫實性和內容倫理性，在在說明是從新/舊對立結構上展開的實用主義觀點。

由此可知，初期文學論無論是文字的改革，或是新小說的建立，都是在新/舊的對立認知上所建構出來的新文學正當性的實用主義觀點。而此文學的實用主義觀點，不僅只是台灣文學的特有現象，更是同樣在和西方文化接觸後，急速被強制編入現代的東亞國家文學，所共同呈現的特徵，<sup>17)</sup>可見台灣初期文學論具有東亞文學的普遍性，且是在文化啟蒙論述的範圍中形成及傳播。

### 三、民族主義論述和主體/他者對立結構

由於台灣的殖民地處境，二〇年代的初期台灣文學論，除了上述實用主義觀點之外，另外還具有民族主義論述性格，此反映了當時知識分子透過文學傳播區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主體/他者對立性認知。二〇年代，此時期受到殖民統治已有一段時間，新聞紙令等殖民當局的各種言論管制也已開始實施，現代論述和文學論固然無法大張旗鼓地闡述民族主義或抗日內容，但從其以新文化運動之名進行的啟蒙工作中，不難發現當中有關民族和國家的概念已然成形，在現代文學論中也屢被提及並廣泛傳播。

陳忻的〈文學與職務〉<sup>18)</sup>，一開始不僅把文學定義為文化的先驅，也強調民族興亡與健全文學有其密不可分的關係；他主張文學的要務，除了「啟發文化」之外，更要「振興民族」。陳端明也在〈日用文鼓吹論〉<sup>19)</sup>中，力倡透過文字改革，「速普及文化，啟發智能，同達文明之域」，同時他也認為新文章「自幼

17) 例如，中國晚清時期的小說救國論、日本明治時期的實用主義文化思潮，以及韓國近代啟蒙期的新小說論都是呈現實用主義觀點。

18) 《台灣青年》一卷一號(1920. 7. 16)。

19) 原載於《台灣青年》三卷六號(1921. 12. 15)，但被禁發行；後重刊於《台灣青年》四卷一號(1922. 1. 20)。

可養國民團結之觀念，其影響於國家不少。」除了新文明的普及以外，他們都把有益於民族和國家的訴求，做為推動文字改革的正當性根據。特別是陳端明所提出的「國民團結」，從他文章中所引用的西歐諸國的興盛和文明利器等話語，可看出它溶含著「國民」背後應該具備現代國民國家的概念。因為他緊接著提出，文學的終極目標必須定在能建立起像西歐諸國那麼強盛的國家上面。

此外，積極提倡中國白話文的黃呈聰也提到：「凡一個國家和一個社會，一定要一個統一的言文，才可以容易普及民眾的智識，做一個中心的勢力，團結一個特別民族的性格……自歐洲戰後一般的文化，也已經普及到民眾裏面去了。因為這個緣故各人很有自覺，勿論人格上、政治上、經濟上的要求也很增加，人的權利和義務都很明白了。」<sup>20)</sup> 除了達到文化普及、民智啟發、世界情勢的認識之外，進一步藉此引發民眾自覺，認識自我民族性格，進而促成民族團結。也就是說，他主張使用白話文，讓每一個人都能自覺到人的價值，進而能夠過起文化生活，最後達到國民團結的境界。他有這樣的認識，應來自於對時代的認知：

現代的政治是民眾的政治，不是像那個封建時代的政治……讀過歐米政治社會的革命史，就會曉得那個時代人民的反抗，為著自由民權生起幾多悲慘革命的事實，來供應我們做參考，也可以給頑迷專制的政治家做教訓了！現在所謂歐米的文化國家，是從人道的見地，施行文化政策，沒有威壓民權，是尊重民意，所以國家和人民都一樣發達起來。總是人民若是沒有教育，文化程度很低的時候，就不能做一個輿論來移動政治的方針，他便就要愚弄民眾作出許多的怪事了。所以我們普及這個民眾的白話文是最要緊的。<sup>21)</sup>

他認為當今世界，在質的層面上與以前相比，已是不同的社會，現代這個社會，已從少數人支配的封建社會，轉變為多數民眾做主人的現代社會。如果要效法現代國家所達到的人民主權等民主主義理念，救出還在專制政權下受難

20) 黃呈聰，〈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台灣》四年一號(1923. 1. 1)。

21) 同前註。

的台灣同胞，那麼就要趕快著手普及文化，引發民眾的自覺。進入現代之後，西方國家打破了以封建貴族為中心的專制政治，建立起所有市民具有同等權利和自由的民主主義政治體制。按照黃呈聰的想法，台灣雖然還是由少數階級掌握權力，然而透過對民眾的開化教育以及文化普及，還是能夠達到實現民主主義理念的現代。他為了要對民眾進行開化教育，使文化普及，主張把西歐文化移植到台灣，進而透過公共領域的擴大，形成廣泛的輿論，同時實施新的教育，以引發民眾的自覺。

由此可知，黃呈聰把當時的台灣情勢，分為少數的專制政治和多數的民眾來了解，這當中專制政治下受苦的多數民眾是指台灣人，而在殖民地社會中少數權力層為日本統治階層。可見他以主體/他者的對立關係來把握當時的民族狀況，同時也可知道他們希冀透過文化普及，最後達成民族團結和民族進步的願望。他們所提出藉由新文學使民族繁榮，並成為對民眾啟蒙的手段，在這樣的想法裡，帶有相信民眾具備自覺能力的期許。當白話文普及於大眾，就能讓大眾累積知識，然後自覺到他們所處的現實，因此文字改革乃是促使民眾自覺的一個準備作業。這種依賴大眾自覺的想法，是基於信賴個人具有理性的關係，換言之，他們相信當大眾接受合理、理性的現代價值之後，個人的自覺可能衍生出更深的覺醒，進而延伸到民族或國家的形成上面。「發揮我們的個性」或者「民眾自覺」，之後便能達成民族團結、國民團結的這種說法，就是意味著他們相信個人的涵養，具有能夠向社會、政治上擴充的外緣力量。這是把民族認同建立在合理的理性主義基礎上而建構的現代文學觀。

另外，介紹中國白話文運動，是因為使用相同文字，容易參考其成功經驗，同時在建立民族認同時，也很自然的就把同族的中國作為參考模型。例如，黃呈聰和黃朝琴在提出主張使用白話文時，相較於台灣語文的白話式表記，他們會更重視已在中國被普遍接受的白話文，應該也是這個緣故。

中國就是我們的祖國，我們未歸日本以前是構成中國的一部分，和中國的交通很密接，不論中國有發生甚麼事情很容易傳到台灣。若就文化而論，中國是母我們是子，母子生活的關係情濃不待我多說，大家的

心理上已經明白了……因為中國的社會和我們的社會是一樣，中國要革新的事，我們也是一樣，所以中國的新人對中國希望革新的事，無異也是對我們一樣的希望了。<sup>22)</sup>

況且台灣兄弟所用的話與北京口音雖然差一點，言語的組織大都相同，一來可以通達漢文的門徑，二來可以做學官話的基礎，做台灣的人，將來欲做實業諸事，非經過中國不可，所以學中華的國語，實在人人都必要的。<sup>23)</sup>

舉出在文化上、血緣上有密切關係的中國作為例子，來強調使用白話文的好處及必要性。由此看來，對中國關係上呈現出來的文化民族主義立場，可說同時具有對抗日本在台實行同化主義的意味。因為日本試圖強行灌輸自己的文化到台灣同胞身上，並積極鼓勵使用日語，限制漢文。因此，初期提倡新文學運動的知識分子，乃起而抗拒，主張學習中國白話文，並試圖從中找到自我，以確立主體性。他們決定不放棄漢文，希望透過漢文的白話化來達成現代啟蒙目的，而且在保存具有民族性的語言上，進行文字改革及建立新文學。

我們台灣的同胞，亦是漢民族的子孫，我們有我們的民族性，漢文若廢，我們的個性我們的習慣我們的言語從此消滅了！所以台灣的學校若不以漢文做必修科，明明將我們無視了。英國的對待殖民地，絕對尊重殖民的個性，不敢強制其學習英語。故我對台灣政府不但希望其保存漢文，尊重台灣人的言語習慣，且希望他將學校所教的漢文改用白話體，使兒童得其實際的學力，切不可置之度外，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萬不可以少數的內地兒童做標準，來犧牲大多數的台灣兒童。<sup>24)</sup>

可見保存漢文及其改革，乃是拿來當作對抗異民族支配，並且建構民族認同的一個手段。他們進一步認為白話文的確立，能帶來民智啟發和文化啟蒙，

22) 黃呈聰，〈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台灣》四年一號(1923. 1. 1)。

23) 黃朝琴，〈漢文改革論〉，《台灣》四年一~二號(1923. 1. 1-2. 1)。

24) 黃朝琴，前揭文章。

台灣也終究可以進入到世界的歷史裡，「和世界的人做共同的生活，才能做世界的台灣」<sup>25)</sup>。這些想法來自進化主義價值觀，而其中隱藏著現代民族國家的觀念。他們都非常重視文學的時代性，把白話文當作教育台灣民眾所需的標準語來推動。這是試圖把封建的老百姓，轉換成現代國民(nation)的啟蒙主義文學觀。他們把文字當作是民族的資產、民族精神的表現工具，以及民族自我定義的手段來認知，而其終極目標則為民族國家的建設。他們以老百姓的國民化—民族認同的建立—國民國家的建設的程序，來企劃出民族主義啟蒙方案。主張文字改革和白話文的使用，被認為是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基礎作業；這種模式，事實上在世界很多國家的文學現代化過程中都曾經出現。例如西方諸國推動現代文學時，多有主張使用個別民族語言的情形；中國的情況也不例外，他們所主張的是共同語文的改良，也就是白話文的使用；而鄰近的日本和韓國也在現代文學運動的初期，主張拋棄漢文，以自國的文字作為發展現代文學的工具。

在文字改革主張中所堅持的文化民族主義，後由透過《台灣民報》正式起動的新文學運動所繼承，其中蘇維霖特別闡述中國白話文學「不單是用白話來做一種『開發民智』的工具，更是一種『建設中國文學』的工具」<sup>26)</sup>，也就是『國語的文學』<sup>27)</sup>。由此我們得知台灣的新文學主導者，接受中國白話文倡者們所提倡的建設民族文學的想法。民族文學的概念，可以說是現代文學理論的成分之一<sup>28)</sup>，中國在引進外國文學之際，展開了文學革命運動，這反映出外國現代文學所保有的精神，與他們期待建構獨立的本國現代文學，兩者間有著密切的關係。當他們在主體和他者、本國和他國之間的關係中認知到自我處境，也曉得現代國家的走向時，新文學運動即能與建立民族文學的期待並行，而這與主張

25) 黃呈聰，前揭文章。

26) 蘇維霖，〈二十年來的中國古文學及文學革命的略述〉，《台灣民報》二卷十號(1924. 2. 11)。

27) 張我軍，〈文學革命以來〉，《台灣民報》三卷八號(1925. 3. 11)。

28) 例如，十八九世紀歐洲主要國家的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即扮演了建立民族文學的角色。在德國，這種現象特別顯著，如Georg Gottfried Gervinus的大作《德國文學史》(1935-1842)即導入進步主義的歷史概念，並開啟民族文學傳統的文學史敘述。

文字改革的理論架構，基本上是一致的，也可說是堅持了文化民族主義的立場。

張我軍也說道：「現在各國的國民文學，非常之昌盛。他們所用的都是白話。我們如欲普遍國民文學，則非絕對的用白話不可。」<sup>29)</sup> 如此強調國民文學的概念，可見對現代國家的想像，在初期理論家的腦中，是多麼地根深柢固。在殖民地台灣的處境中，他們試圖在主體/他者的對立結構上建立現代文學，可知他們所期待建立的也是一個國家的文學。

不過，由於當時的新文化運動，排除了政治運動，而以文化啟蒙運動名義出發，以致無法發展到將台灣認知為一個獨立國家的階段。<sup>30)</sup> 他們雖以中國的文字、文學革命為媒介，提出自己的文字與文學改革主張，把自己認為是有別於日本民族的不同存在者，但在殖民地處境中，這樣的說法並不具實在感，只是一種概念而已。即令如此，一如上述，當時的文學論中，還是顯示出民族觀念已然形成，而且充滿著國家的想像。這一點可以參考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說法。以「民族主義的起源和傳播」為副標題的《想像的共同體》<sup>31)</sup> 中，安徒生採取有別於政治意識形態的觀點，深入探討民族主義的形成，以及民族成為一個有意義的共同體社會、文化的過程。他同意民族這個共同體的出現，與中世紀的封建秩序和宗教價值的崩潰過程有關，但他更強調的是，在資本主義的成立過程中所出現的一個被想像的共同體，才是民族的本質。以一個作為具有領土和主權的政治共同體民族的形成來說，它與印刷資本主義的擴大過程絕對有脫離不了的關係。他舉出以下例子說明，17世紀以來，原本使用多種地方語言的西方社會，隨著各地方語言標準化了之後印刷出版的書籍發行，閱讀同一語言印刷品的人們，也跟著逐漸形成區別自我與他人的一種紐帶意識，如此人們對語言同質性的認知產生了，民族的境界也就更形鞏

29) 〈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穢中的破舊殿堂〉，《台灣民報》三卷一號(1925. 1. 1)。

30) 例如，陳端明講到台灣已經歸日的問題，認為台灣扮演的角色應在日中親善和橋樑搭建上面，因此漢文的廢除必不可能。他用日本的殖民論述來陳述漢字保存的邏輯。

31)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y: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Editions, 1983); 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台北，時報出版，1999)。

固。按照安德森的此一說法，二〇年代隨著報紙、雜誌等印刷品的發行和公共領域的產生，以及因此自我/他者的對立性認知的形成，在在都驗證著台灣初期民族主義的形成過程與此相呼應，而主張民族團結的現代文學論也反映了此一歷史事實。

#### 四、個性主義論述和真/假對立結構

如上所述，台灣現代文學論的開展，在文化啟蒙、民智啟發，以及民族團結和現代國民養成的目的之下，一開始就強烈形成了文化啟蒙和民族主義論述。但是隨著有關新文學的進一步討論，產生了文學反映個人情緒和形式上的虛構屬性等文學獨自性的認知。陳炯所提出的文學成分之一：「真摯之情感」、「夫情感者文學之靈」，以及黃呈聰所提出：「自家的個性」和「獨創的能力」，雖然未被充分討論，但除了文學的現實效用性以外，同樣都重視個人的自然感情和個性的表露。這些想法，把言文一致的文字改革討論，推到文學理論的層次，因為他們認為言文一致的新文學，是開啟能直接吐露個人真實心性、感情和思想的一扇門。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他們非常肯定人的自然感情，並且主張文學應該要提供直接表現感情的通路。可見他們對人的看法已有新的認知，也就是把個人從當為性的道德規範中解放出來，正面看待個人主體的存在及其可能性。

蔡孝乾也在〈中國新文學概觀〉中，將中國新文學分為新詩和新小說，分別介紹理論和代表作品。就詩而言，他借用劉半農、胡適、康白情等人的理論，指出新詩的特徵在於形式上的自由與內容上的「真」。康白情說新詩的意義，在於「破除一切桎梏人性的陳套，只求其無悖詩的精神罷了。」而「新詩的要素分為兩種，一就形式而言，一就內容而言。形式有音樂的和刻繪的兩個作用，內容有情緒的和想像的意境。」蔡孝乾引用康氏的說法作為佐證，認為新詩能擔任從封建桎梏中解放人性的角色。他又引用了下面胡適的一段話：

這一次中國文學的革命運動，也是先要求語言文字和文體的解放。新文學的語言是白話的。新文學的文體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初看起來都是「文的形式」一方面的問題，算不得重要。卻不知道形式和內容有密切的關係。形式上的束縛，使精神不能自由發展，使良好的內容不能充分表現。若想有一種新內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縛精神的枷鎖鐐銬。因此中國近年的新詩運動可算是一種「詩體的解放」，因為有了這一層詩體的解放，所以豐富的材料、精密的觀察、高深的理想、複雜的感情，方才能夠跑到詩裏去。<sup>32)</sup>

胡適認為詩體的解放，就是內容的解放，也是人性的解放。從上面康白情和胡適兩人的說法裡，我們可以推斷人的情緒和想像，就是構成新詩的內容—「真」。如果進一步分析，以人的真實感情和想像的表現，才能成為新詩的內容來看，可以知道他們開始注意到新文學擁有的虛構特質，而想像和虛構的概念，正是西方現代文學觀的核心要素。<sup>33)</sup>

同時他又把中國新文學的詩進一步分類為抒情詩與敘事詩。有關現代文學知識的核心概念，乃是建構在分門別類的原理之上，這也是現代西方文學理論的基礎。因此我們可以說，包括胡適在內的中國新文學理論家，以及透過它來建構台灣新文學的蔡孝乾等人，都是受到西方文學觀念的影響，而他們的理論也因而呈現出具有獨立性文類體系的現代文學論因素。<sup>34)</sup> 新文學運動初期的理論家已經認知到文學有別於其他學問，是思想和感情的自由表現，由此可見他們對文學的自律性有了一定的自覺，可說具備了現代文學觀。

在這個基礎上，張我軍正式開啟了台灣的文學改革。當時還在北京留學的

32) 蔡孝乾，〈中國新文學概觀〉，《台灣民報》三卷十二~十七號(1925. 4. 21-6. 1)。

33) 在現代西方，虛構的、想像的文學概念的成立，是因為小說逐漸在文學作品中佔有相當高比重的份量，使得他們需要一個新的概念，來把小說拉抬到與詩、劇一樣的文學地位。René Welleck在《何謂文學》中也提到，一直因輕薄為由而不受到重視的小說，逐漸具有威勢，開始扮演起幫助文學的角色，使它能與美術、音樂並行，有著一樣的藝術價值。

34) 雖然中國自古代就有文學的分類觀念，不過新文學運動當時，胡適等人所接受的「文學」，並不是中國傳統的文學觀念，而是literature的譯語，因此他們所接受的文學分類概念，也是來自現代西歐文學的概念。

張我軍，在〈糟糕的台灣文學界〉<sup>35)</sup>等一連串的文章中<sup>36)</sup>，對偏重技巧和形式已變成「擊鉢吟」的台灣舊式詩文，提出了強烈的批判。張我軍並且洞悉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世界思潮的變化，他認為「文學」一詞和政治、外交、經濟一樣，也是隨著現代化的潮流所引進的新文物名稱。

自從十五世紀文藝復興(Renaissance)起於歐洲以來，西洋的文學，煥然一新，迥非昔日可比，自古典主義而浪漫主義，自浪漫主義而自然主義，到現在，自然主義的時運也已去了，所謂新理想主義，新現實主義，已佈滿了全世界的文壇了。就是文化落後的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跟政治運動之踵，文學革新運動也蹶起了。明治、大正的文壇上，出了不少的戰士，站在睡眼朦朧的文壇上雄呼疾叫不遺餘力，現在他們的成績顯著，差不多已不讓歐美獨擅其長了。而且社會上、政治上的亂麻似的中國也已經過了一番新生命的洗禮了，所以現在中國的新文學，也大有可觀了。總之，現在的時代，此論甚麼都以世界為目標，如政治、如外交、如經濟等等都是世界的，文學也不能除外，所以現在的文學，已漸趨於一致，而世界的文學的成立，也就在眼前了。<sup>37)</sup>

可見他明確地把握了世界思潮的進展狀況，認為當代不是可以被孤立的時代，而是要在許多方面跟上世界歷史發展的時代，在此認知下，文學方面自然也要趕上潮流。這裡他所認知的當代，就是現代的觀念，一個走向開放、進步、發展的時代。在具體的文學理論方面，張我軍以胡適的「八不主義」和陳獨秀的「三大主義」為根據，展開他自己的新文學理論。他在解釋「八不主義」時，提出思想和情感的重要性。他強調文學不是遊戲，也不是別人的話，而是自我感情的誠實表現。文章的呈現要描寫自己能掌握的事物，「不失求真」，力求創造性。他把這些當作新文學的要素。<sup>38)</sup>在這樣的基礎上，他認為所謂的文學，

35) 《台灣民報》二卷二十四號(1924. 11. 21)。

36) 〈為文學界一哭〉(民報二卷七號)；〈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穢中的破舊殿堂〉(三卷一號)；〈絕無僅有的擊鉢吟的意義〉(三卷二號)；〈揭破悶葫蘆〉(三卷三號)；〈復鄭軍我書〉(三卷六號)等文章即是。

37) 〈糟糕的文學界〉，《台灣民報》二卷二十四號(1924. 11. 21)。

38) 〈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穢中的破舊殿堂〉，《台灣民報》三卷一號(1925. 1. 1)。

要具備「徹底的人生觀」及「真摯的感情」，是「所感於心，而不能自己，自然而然的寫出來的」，他主張追求自由奔放，就是文學本來的面貌。<sup>39)</sup> 這些主張可說打破了因襲桎梏，追求自由奔放，是朝向人性解放的反封建現代啟蒙意識的產物。在這裡的自由奔放，便成為批判舊文學的一個根據，他說舊式詩文「一、限題 二、限韻 三、限體 四、限時間；有時還要限首數。文學的境地是不受任何束縛的，是要自由奔放的。」<sup>40)</sup> 因此強調沒有拘束，才能發揮作者的個性。另外他也重視「情感」，認為它是區分文學和其他學問的要素。他肯定有感情、有感覺的生活，每個人的個性正是在這種有感情、感覺的生活下，充分發揮出來。如此，他的文學論可說就是在這種重視個性、肯定個人價值的現代價值觀上建立起來的。

另外，他說：「台灣的文學，除詩之外，似乎再沒有別種的文學了，如小說、戲曲等不會看見」。並且批判台灣文學所有的詩，皆已淪落到實用性工具的地步。他痛恨「把這神聖的藝術，降格降至於實用品下，或拿來做沽名釣譽，或拿來做迎合勢利之器具，而且自以為儒雅文，其實這種器具得來的名利，與用金錢得來的有何分別？」<sup>41)</sup> 可見他反對文學淪為遊戲或實用的工具。他認為文學的創作並不是為了獲得社會地位或名譽的一種手段，而是基於其本身的必要性。如果說文學要表現個人的「真」情感，那麼為了沽名釣譽而作的文學，是一種沒有情感的「假」文學。他對文學抱持這樣的想法，強調文學的獨立性和自律性，並認為文學的獨立性和自律性，是建構在內容和形式的基礎上，可見他是以藝術的一種形式來認知文學。

在〈詩體的解放〉中，就詩的本質以及改革的理由，他提出了以下的說明。

高潮的感情+醇直的表现=緊迫的節奏=詩，詩是以感情為性命的。  
感情差不多就是詩的全部，然而感情若只在心裏高潮而沒把牠表現

39) 〈絕無僅有的擊鉢吟的意義〉，《台灣民報》三卷二號(1925. 1. 11)。

40) 同前註。

41) 〈糟糕的台灣文學界〉，《台灣民報》二卷二十四號(1924. 11. 21)。

-醇直的全部表現-出來，還不成為詩。所以有了高潮的感情更醇直地把牠表現出來，便自然而然的有緊迫的節奏，便是詩了。……自由詩是從法語versliben譯出來的。象徵派的諸詩人於詩的形式上行了一大革命，他們不願受他人所制定的規則來制限，他們不願為古典的苦難的詩的法則所束縛，他們為欲表現他們的禁不住的心靈的呼籲，所以對於古典詩，對於一體束縛自由詩形豎起反旗，站在一種極自由的新的型式之下，努力欲求獲一種合於個性的詩形。<sup>42)</sup>

張我軍認為詩是文學的精髓，在詩裡最重要的是感情和表現方式。除了同時兼顧感情與表現之外，他也闡釋詩的文類特徵在於「緊迫的節奏」。至於節奏，他將它分為形式律（平仄法、押韻法、音韻律）和內容律（內在律）兩種，並引用章太炎《古詩流變》的見解，指出屬於前者的舊詩（絕律詩），偏重形式和技巧，具有「矯揉造作，不顧自然」的缺點，導致思想感情容易遭到埋沒或被抹殺。這些形式上的束縛，導致壓抑率真的感情和情緒的表現，成為文學革命的起因。例如在十九世紀後期的西洋、在二三十年前的日本、在七八年前的中國所發生的自由詩運動，就是為了打破詩在形式上的束縛。這些運動所追求的，是「對於一切束縛自由詩形豎起反旗，站在一種極自由的新的形式之下，努力欲求獲一種合於個性的詩形」，至於詩的韻律，「他們的詩的韻律和從來的外面的韻律法不一樣，是內面的韻律，即內容律。他們作詩是依靠從自己的心臟的呼吸生出來的韻律。內部的節奏所以也有二三字一行的，也有十數字一行的。」因此期待在台灣也能產生依據內在律寫成的新詩。詩的形式改革之所以重要，就在於它不論呈現何種感情，都能表現出作者的個性，這是他的新詩論所呈現的文學現代性特徵。

追求作家個性或虛構性，以及文學獨自性的認知，在張梗〈討論舊小說的改革問題〉當中也看得到，他所主張六條改革方案中，首先即提出要區隔文學和其他學問的異同，再以文學的獨特性格，提出藝術性和文學性。為了確保作品的文學性，他認為作者唯有深藏含意才能做到，同時他又認為個性的描寫乃

42) 《台灣民報》三卷七號~九號(1925. 3. 1-3. 21)。

小說成功的關鍵因素。他對小說文類的敘事特徵也有所認知，例如他非常重視描寫的手法，以及文體的個性。他考慮到這不只關係到作者的創作態度和手法，更進一步影響到讀者的理解，因此主張小說並非作者生硬理念的討論場地，而是具有文學性的一種藝術品。依此，他認為作者應把理念放在小說內部，以有機結合的方式隱露綻現，不需一五一十的交代清楚，只需點出即可。

初期文學論中所呈現以新的書寫形態來認知文學的看法，與以現實批判和文化普及為目的的啟蒙主義民族論述不同，它所體現的是文學的另一種現代性－內容上的個性表現，以及形式上的虛構特徵。不過，它同時也必須呈現，被覺醒的個人才能構成現代國民的想法，以及個人主體的成立，始能成為推動文化普及和對民族處境有所自覺的前提。此為初期文學論中同時出現實用主義、民族主義和個性主義看法的原因，也是此三者不構成相互矛盾的理由。而這當中所指的文學，與傳統文學概念不同：書寫和閱讀的傳統文學，指的是教養和知識的累積，也是指做人的道理及修身養性的過程；而新的文學概念，則重視個人的情感和興趣，認為能發揮作者的個性和真實情感才有真價值。如是，在西方藝術領域的文學概念的影響之下，二〇年代台灣新文學，逐漸從學識、教養和德望等既有「文」的性格中分離出來，進而加強其藝術領域的文學性格。在初期新文學論述的分化過程中，台灣的現代文學論建構，是從啟蒙上必要的實用觀點，進展到重視文學獨自性價值，使得文學歸依於藝術層次，由此在個人情感的真/假對立性認知上建構的文學，自是具有不同於實用學問的獨特價值。

## 五、結語

以上各節我們概略考察了初期台灣文學論所呈現的啟蒙性格及其論述結構。文章中所分析的實用主義、民族主義和個性主義文學論述，可以說是在殖民地處境中，較晚一步進入現代歷史階段的台灣文學現代性的主要特徵。這些具有如此內容的初期文學論，係透過報章雜誌等現代公共領域傳播，同時以新

舊文學論爭的形態進行，這說明它並非單純的意見提出，而是隱含有意按照自己信念，試圖改變對方想法的意圖，亦即，它帶有濃厚的論述性格。換言之，初期文學論以改造社會為目的，明白呈現社會關係，而且新的知識分子又以民族啟蒙為口號，向民眾或舊文人等特定對象發話，強烈吐露他們的新文學信念和主張，遂而在社會上引起廣泛影響。

其中，實用主義論述，建構在新/舊的對立結構上；民族主義論述，以區分自我/他者的方式討論文學的功能；個性主義論述，在內容上把個人情感的真/假對立起來，肯定文學表現的率真感情和情緒，在形式方面，則重視虛構性和形象性。透過這三組對立結構來築構三種性格的初期文學論，在台灣和世界文學的發展史上，具有下列意義：第一，接受現代理念和價值，對傳統文字和文學提出批判，呈現反封建及現代指向；第二，結合文學和民族命運的民族主義論述，來自台灣的殖民地不平等地位和處境，不僅呈現出反帝國主義性格，在企圖建立民族文學的努力上面，也反映了世界普遍的現代性樣貌；第三，個性主義中所呈現的個人主體的發現和自覺，以及對於文學擁有的表現獨特性的認知，將實用性文學論帶到了藝術層次上討論，展現了文學的現代性性格。

從這些內容來看，二〇年代台灣初期文學論，呈現反封建、指向現代民族國家和民族文學、追求個人主體的覺醒和個性的發現等，不僅具有普遍現代性，同時也強烈表露反帝國主義性格。加上，為了民眾啟蒙，文學可以作為手段的實用性觀點，以及與此不同，文學要透過其獨特方式來呈現個人真感情的藝術觀點，看似矛盾的文學觀同時被提出，呈現台灣獨特的現代性面貌。依此，二〇年代初期文學論所呈現的世界普遍性和台灣特殊性，可說是初期知識分子，一方面試圖接受西方現代文明和價值來改造自己，另一方面又欲求脫離西方文明所引來的殖民統治，同時從個人主體的成立中，尋求此兩種矛盾目標所作出努力的軌跡。

## 參考文獻

### 一、史料

- 《台灣青年》創刊辭·卷頭言，《台灣民報》七十二號(1925. 9. 27)
- 炳，〈社會改造和我們的使命〉，《台灣民報》一卷四期(1923. 7. 15)
- 陳炯，〈文學與職務〉，《台灣青年》一卷一號(1920. 7. 16)
- 陳端明，〈日用文鼓吹論〉，《台灣青年》四卷一號(1922. 1. 20)
- 甘文芳，〈現實社會與文學〉，《台灣青年》三卷三號(1921. 9. 15)
- 黃呈聰，〈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台灣》四年一號(1923. 1. 1)
- 黃朝琴，〈漢文改革論〉，《台灣》四年一~二號(1923. 1. 1-2. 1)
- 秀湖，〈中國新文學運動的過去現在將來〉，《台灣民報》四號(1923. 7. 15)
- 蘇維霖，〈二十年來的中國古文學及文學革命的略述〉（《台灣民報》二卷十號，1924. 2. 11)
- 張梗，〈討論舊小說的改革問題〉，《台灣民報》二卷十七~二十三號(1924. 9. 11-1924. 11. 11)
- 蔡孝乾，〈中國新文學概觀〉，《台灣民報》三卷十二~十七號(1925.4.21-6.1)
- 張我軍，〈糟糕的文學界〉，《台灣民報》二卷二十四號(1924. 11. 21)
- 張我軍，〈文學革命運動以來〉，《台灣民報》三卷六~九號(1925. 2. 21-3. 21)
- 張我軍，〈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穢中的破舊殿堂〉，《台灣民報》三卷一號(1925.1.1)。
- 張我軍，〈為文學界一哭〉，《台灣民報》二卷七號(1925. 2. 11)
- 張我軍，〈絕無僅有的擊鉢吟的意義〉《台灣民報》三卷二號(1925. 1. 11)
- 張我軍，〈揭破悶葫蘆〉《台灣民報》三卷三號(1925. 1. 21)
- 張我軍，〈復鄭軍我書〉《台灣民報》三卷六號(1925. 2. 21)
- 張我軍，〈詩體的解放〉，《台灣民報》三卷七號~九號(1925. 3. 1-3. 21)

## 二、論文及書籍

- 《吳德功先生全集》，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
- 周婉窈，《台灣歷史圖說：史前至一九四五年》，台北，聯經，1997
- 廖漢臣，〈新舊文學之爭－台灣文壇一筆流水賬〉，《台北文物》3卷2期、3期，1954. 8、10
- 莊淑芝，《台灣新文學觀念的萌芽與實踐》，台北，麥田，1994
- 梁明雄，《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運動研究》台北，文史哲，1996
- 施懿琳，〈日治時期新舊文學論戰的再考察——兼論其對台灣傳統詩壇的影響〉（中華文化與文學學術研討系列－第四次會議），台北，台灣古典文學與文獻，1998
- 葉連鵬，〈重讀日據時期台灣新舊文學論戰——起因、過程與結果的再思考〉，《台灣文學學報》2期，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2001，頁33-65
- 黃美娥，〈對立與協力：日治時期台灣新舊文學論戰中傳統文人的典律反省及文化思維〉，《台灣文學學報》4期，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2003，頁37-72
- 翁聖峰，《日據時期台灣新舊文學論爭新探》，台北，五南，2007
- Bakhtin, M. M & V. N. Voloshinov,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trans. M. Ladislav and I. R. Titunik, Harvard Univ. Press, 1973.)
-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y: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Verso Editions, 1983); 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台北，時報出版，1999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Literature Modernity:  
Analyzing Taiwan Modern Literature Theory

Choi Mal-Soon

Taiwan Modern Literature Theory as a subject, this essay is about analyzing its enlightening content and structure. The main content of enlightenment is concluded to be Utilitarianism, Nationalism and Individualism. Among these initial literature theory, some were shown by the way of New/old Literary Fliting, with strong character of discourse. Therefore, after analyzing the structure of discourse in this essay, it is found that Utilitarianism is constructed on dualistic structure of New/Old; Nationalism discusses the function of literature by separating Self/Others; Individualism approving forthright, sincere and feeling of literature expression, makes opposition of True/False of personal emotions, meanwhile, emphasizing fictional and imaginary properties in formalism.

Building three characters through these three opposing structure, contains meanings below over Taiwan and Worl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First, accepting modern concepts and values and giving criticism of traditional word and literature presented anti-feudal and modernity. Second, combining literature and nation fate under Taiwan's unequal colonial status and situation not only showed the anti-imperialistic character but also reflected the universal modern appearance of the time on effort of build up national literature. Third, the discovery of personality and selfhood in Individualism as well as unique cognition of literary expression, had pushed practical literature theory to an art level, and emerged the modern character of literature.

Key Words :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aiwan Modern Literature Theory, Utilitarianism,  
Nationalism, Individualism

투 고 일 : 2010. 1. 10. / 심 사 일 : 2010. 1. 15. ~ 2010. 2. 10. / 게재확정일 : 2010. 2. 15.